

中國文化研究所通訊

ICS BULLETIN

二〇一四年 第二期

五十年驀回首

陳方正 中國文化研究所

陳方正博士在美國哈佛大學和普蘭代斯大學 (Brandeis University) 分別獲得物理學學士及物理學博士學位。一九六六年加入香港中文大學物理系任職講師，一九七七年升任高級講師。一九八零年出任大學秘書長，至一九八六年出任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陳博士為一位傑出學者和大學行政人員，於香港中文大學服務近達五十年，現任中大中國文化研究所名譽高級研究員、聯合書院資深導師，及物理系榮譽教授。陳博士於二零零四年獲頒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竺可楨講席教授。

陳方正博士在文中回顧了自己在香港中文大學近半個世紀的教學、行政和研究工作，從中可見陳教授對大學發展及推動中國文化研究與建設的影響。

我在1966年完成學業，回到香港中文大學任教，至今已經將近半個世紀，其間香港起了翻天覆地變化，中大茁壯成長，我自己為學做事，也經歷了好幾次轉變。回顧這段漫長光陰，正好分成三段，每段十四年。

第一個「十四年」是從1966到1980年，那時我初出茅廬，在物理系教書、做研究，還參加一些大學事務，工作繁忙而愉快，除了對學生作些一般性演講，和為報章、雜誌寫點小文章以外，並沒有機會跟文科打交道。可是，從中學開始，我就已經對這方面懷有興趣，本科階段修課很自由，我花了大約三分之一時間在文史哲課程上。所以，在物理系的十四年間我心底裡一直醞釀著某些模糊的想法。在五、六十年代，學科之間隔閡很深，科學教育所注重的，只限於科學本身，它的社會效果、對人類整體的影響等等絕少被提及——在我大學畢業那年Rachel Carson的《寂靜的春天》出版，它被視為另類通俗讀物；十年後，E. F. Schumacher的《小更美麗》成為時興，

但僅此而已。至於科學發展的歷史，或者它的哲學、宗教背景，對一般科學工作者來說，更是空白一片，我也不例外，最多只多了一點好奇吧。從1980年開始，我轉到秘書處工作，前後一共六年。在我的學術生涯中，這是個重要的轉折期（interregnum），它讓我停下來，重新思考未來生活和工作方向，也讓我有機會寫一些當眾宣讀的文章，最後為我帶來進入中國文化研究所工作的機緣。

就這樣，開始了我的第二個「十四年，即1986-2000年。在當時，中國文化研究所是個不大為人注意，也沒有多少活動的冷門單位，只有它屬下的文物館不時舉辦展覽，開幕儀式搞得很熱鬧，惹人注目。我到研究所之後，一方面支持原有工作，例如田野考古發掘和翻譯出版計劃，也推動新的發展，例如幫助創辦《中國語文通訊》，但真正下工夫的則是另外三項：和金耀基、金觀濤、劉青峰等三位合作，創辦《二十一世紀》雜誌，為全球中國知識份子提供一個思想交流園地；創立「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它舉辦不少講座和研討會，也出版了多種頗有影響力的專書，包括十卷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以及和劉殿爵教授合作，建立中國傳世古籍資料庫，並且在這基礎上出版六十多種相關典籍的索引，這以後擴展到出土文獻資料庫的建立和出版，那是和饒宗頤教授合作的。這幾項工作能夠順利開展有幾個因素：一方面研究所本身就有一些資源，更重要的是我們得到校方，特別是高錕校長的支持。例如辦《二十一世紀》遭遇不少阻力，他能夠充分認同其理念是很難得的。此外，我們很幸運，碰上了八十年代末香港政府推行新政策，開始資助大學研究工作，否則像建立古籍資料庫那樣的工作是無從談起的。

此外，我也做些自己的研究。當時我對「現代化比較研究」深感興趣，它的核心問題是，為什麼非西方國家追求現代化，所得結果差異那麼大？西方學者曾經試圖用社會學觀點回答這問題，但不成功，其後蘇聯的鉅變更加證明其看法片面，所以我決定自己從頭再摸索。我最先探討的是土耳其，它長期和歐洲對抗，後來淪為「近東病夫」，最後在凱末爾（Mustafa Kemal Atatürk）領導下振作起來，逃脫被瓜分命運，所以他深受孫中山仰慕。土耳其和滿清治下的中國不一樣，它出現過多位大有為的集權君主，然而他們的改革最終都歸於失敗——因為伊斯蘭保守勢力太強大了，只有凱末爾看清形勢，以斷然手段剷除此障礙。俄國的情形更奇特，它的現代化在十八世紀之初起步，是擁有絕對權力的沙皇以堅決意志，自上而下銳意推動的，而且沒有受制於內部阻撓或者外力干預，這比中國在內憂外患夾縫中求改革是幸運太多了。但經過兩百年努力之後，俄國的現代化同樣失敗。為什麼？我的看法是，現代化歷程受不同類型因素影響，包括隨機性的（例如人物組合）和結構性的（例如社會和文化傳統），兩者互為交錯。Marc Raeff在《瞭解帝俄》這本書中認為，沙皇雖然具有堅決意志和強大操控力量，但不認識「現代」的根本意義，因此努力歸於徒然，那很有洞見。此外，為何西班牙在十六世紀是先進強大的海上帝國，到十八世紀卻淪為英法爭奪霸權的附庸？在十九世紀初日本還是一個分裂的封建國家，為何能夠在三十年間躍居東亞霸主？這些都是我在九十年代花了相當精力思索的問題，但問題太大太複雜，沒有足夠功夫深入探索，能夠留下的除了文章之外，只有一套六種的翻譯叢書《現代化衝擊下的世界》（上海學林出版社，1996），它頗受注意，如今有兩種已經再版了。

這時我對科學史也開始發生興趣，經過很偶然。其初是為講課而涉足中國天文學史，從而接觸到中國第一本天文學典籍《周髀算經》，又因為參加國際漢學會議而寫了一篇研究此書的論文，由是連帶對中國數學發生興趣，一口氣寫了好幾篇這方面的文章。1997年底我在《二十一世紀》發表《為什麼現代科學出現於西方》一文，那就是日後出版《繼承與叛逆：現代科學為何出現於西方》這本專書的起點。

在世紀之交我滿六十歲，應該考慮退休了。其時研究所慶祝成立二十五周年的活動結束未久，我撰寫和編

輯了一本《與中大一同成長：香港中文大學與中國文化研究所圖史1949-1997》作為紀念，它剛好在2000年出版，這就成為我第二個「十四年」結束的標誌。

在中大服務三十六年之後，我在2002年退休，不再負責研究所的事情，可以用全部時間做學術研究了，至此方才領略到「如釋重負」和「海闊天空」的滋味。那年我出版論文集《站在美妙新世紀的門檻上》，又應湯一介教授之邀，到北大去作「蔡元培講座」和「湯用彤講座」，內容以過去批判科學哲學潮流和時下自由平等觀念的論點為主，後來由北大出版社結集出版。翌年我應陳少明兄之邀，到廣州中山大學哲學系做了好幾個有關科學與其他學科之間關係的演講，其後也整理成多篇文章發表。但學術上對我影響最大的，則是2004年受劉鈍兄之邀，到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擔任「竺可楨自然科學史講席」，主要是作公開演講，和教授研究生課程。為此我準備了大約十萬字講稿，那基本上是一部雛形的西方科學史，包括其背後的宗教、學術和歷史背景。三聯書店的編輯張艷華女士也來聽講，課程結束後她邀我將講稿整理出版，我很爽快地答應了，約定一年後交稿。這自然是太天真了，因為那講稿只不過是個提綱，要寫成有分量的專著還需要對細節作深入分析和討論。結果我用了足足四年功夫，才把所能夠找到的資料都弄清楚和整合起來，《繼承與叛逆》這本書才終於得以在2009年面世。在西方，科學發展有兩千多年歷史，科學史本身出現也有將近一個世紀，所以我工作的絕大部分是吸收和整理前人成果，然後寫成完整、有系統的歷史，說不上多少原創性發現。但我強調一點，即古希臘《幾何原本》的出現代表一個突破，也就是西方科學的第一次革命。換而言之，牛頓的古典力學並非西方科學革命的第一次：它已經是第二次了！這以前不是沒有人知道，但沒有人明確地講出來。古希臘科學革命是怎樣產生的呢？它和畢達哥拉斯神秘教派對於宇宙奧秘的追求，特別是對「數」的崇拜，有極為密切關係。所以，很奇妙和吊詭，西方科學的根源是從宗教那裡來的：在古代，也只有宗教和它的「永生期盼」才具有偌大魔力，可以吸引、推動當時的一流人才獻身於沒有應用價值的抽象觀念和理論。事實上，基督教關於靈魂不滅，人可以獲得永生等觀念在希伯來一神教裏面本來也不存在，它的起源也很可能和畢達哥拉斯教派有關。

我為什麼會要追尋西方科學的起源？這主要是由《周髀算經》觸動的，它和《九章算術》並稱中國古代數學兩大寶典，但就思想深刻和論證精密而言，它們不可能和同時代甚至更早的《幾何原本》相提並論。往上追溯《原本》的淵源，我們就發覺有兩條不同線索。首先是古巴比倫數學，它出現於公元前1900-1600年，即夏商之際，但在某些方面已經遠遠超越《九章》——例如它已經能夠系統地解二次方程。另外一條線索就是畢達哥拉斯。他所創立的神秘教派同整個西方學術傳統，包括柏拉圖和他的學園(Academy)，都有密切關係。例如《對話錄·國家篇》說，治理國家的人應當受音樂、天文、算術、幾何等通稱為「四藝」的理性思考訓練，那就是繼承了畢氏教派的觀點。在中國，這樣的思想恐怕難以立足，更不要說發揚光大了。但在西方，畢達哥拉斯成為了智慧源泉的象徵，影響歷久不衰，直到十七世紀的開普勒仍然醉心於此教派的某些奇特觀念。我花了很多精力研究畢達哥拉斯及其影響，最終就形成了上述「西方第一次科學革命」的觀點。當然，這也就是我質疑李約瑟的開始：他對中國古代科技（其實主要是技術）成就的過分推崇、讚嘆，對古希臘科學特別是數學的貶抑，以及對伊斯蘭和歐洲中古科學淵源的漠視，我認為是很不客觀的。國人往往為他的論調感到自豪，但這種盲目樂觀情緒對中國當代文化的發展並沒有幫助。

那麼，中國與西方的古代科學到底應該如何比較呢？事實上，我們古代基本上只有一本《周髀算經》是符合現代科學精神的：它提出了一個太陽運行的模型，用以解釋日出日落，夏日長冬日短等自然現象，再把它引申，用以解釋北極和赤道區域的寒暑晝夜。而這一切，都是從基本假設出發，然後用數學推理方式得出來。但這書有明顯缺陷，所以後來被否定了，連帶它的思維方式也被忽略、遺忘。當然，我們還有一本《墨子》，其中也包含

一些科學觀測，例如關於透鏡的。我們的古代科學可以跟古希臘比較的就是這些了，其實是很貧乏的。更令人惋惜的是，即使這很少的一點，也沒有能夠在中國文化中生根發芽，不久就湮沒無聞，《周髀》如是，《墨子》也不例外。為什麼古代中國沒有使得思辨性、理論性科學成長的土壤呢？明顯的答案是，中國人太務實，因此對於沒有明顯實用價值的理論探究不感興趣，而古希臘人則喜愛思辯。但在這答案後面，可能還有更深一層理由，因為大部份希臘人其實也同樣很務實，這從它的喜劇往往以哲學家為嘲諷對象便可知道。我的看法是：古希臘由幾百個分處不同地域的獨立城邦組成，所以它包含很多龐雜的異質 (heterogeneous) 成分，而並非一個同質 (homogeneous) 社會，因此主流以外的特殊思想、觀念能夠在其中找到生存空隙 (niche)，或者在環境劇烈變動的時候，轉移到其他生存空隙。中國則完全不一樣，它很早就形成大一統政治格局 (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和近乎同質的文化氛圍。這樣的社會不但不利於特殊思想、理念發展，而且秉持特殊理念的人「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很難找到安身立命的小空隙。我曾經寫過文章論證中國傳統數學發展的一個悖論：它在「盛世」 (例如漢唐北宋) 缺乏創新，但到了「衰世」 (例如魏晉南北朝和宋元之際) 反而爆發驚人力量。這其中關鍵就在於，衰世是國家分崩離析，正統文化理念衰落的時代，所以能夠刺激和容納特殊思想、觀念生長。

總體看來，中國古代科學的特點在於它的實用精神，這在中醫藥的強大生命力上表現得最為明顯。但中醫不是推理科學，它沒有在自然現象中探求少數根本原理的觀念，而主要是經驗科學。它的「理論」基本上是將實踐中所累積的大量經驗加以現象性的歸納，而並不尋求形成邏輯體系。當然，對於人體這個高度複雜的機體來說，中醫的綜合判斷方式的確在某些方面具有優越性，因此它至今仍然沒有被現代醫學淘汰，仍然有生存乃至進一步發展的空間，這可以說是個奇跡。

談到科學史，它在西方已經有將近兩百年歷史，但成為大學學科，則只能從1920年代算起，還不足一個世紀。不過，從上世紀六十年代開始，它的發展就非常蓬勃，有一日千里之勢了。至於在中國，它至今仍然處於起步階段：雖然研究數學史、天文學史的學者如李儼、錢寶琮出現於二三十年代，科學史則要到1980年代方才被納入大學課程，提供科學史課程和學位的大學至今仍然屈指可數。至於在本港，據我所知，從事科學史研究的學者更寥寥無幾。很不幸，看來這種低迷狀況是不容易在短期內改變的。

科學史的重要性不僅僅在於它和科學有關，更在於它和整個西方文明的根源血脈相連。因此，現代科學為何出現於西方，與現代世界為何出現於西方，在很大程度上是同一問題的兩面。自五四以來，中國人就渴望瞭解西方。但要真正瞭解西方，瞭解現代世界，就必須深入瞭解西方文明如何在歷史中形成，而不能夠僅僅著眼於它過去一兩百年間的政治和經濟發展。我認為西方的科學史——當然還有宗教史、思想史，亟待國人悉心探究，原因就在於此。當然，說到底，這是極其長遠的事情，它不僅僅關乎一兩個人，一兩所大學，而是需要整個民族在觀念和思維方式上的轉變來完成的。現在我第三個「十四年」已經結束了，以後的道路仍然漫長，我只能夠希望，有心走此路的人會慢慢多起來吧。

馬悅然與中文大學 2014

— 訪談節錄 —

適逢首位「饒宗頤訪問學人」馬悅然教授於2014年3月到訪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副所長黎志添教授藉此機會訪問馬教授，回顧馬教授跟香港和中文大學的關係，了解他最近的研究課題和出版成果，並談談他對中大在中國文化研究未來發展中有何期望。以下是馬悅然教授的訪談節錄：

我1948年至1950年去中國四川做了兩年的方言調查，然後1950年7月到香港住了一段時間。那時我26歲，拜訪了建立新亞書院的錢穆先生。他當時已是非常知名的學者，還在校務繁忙中，抽出時間熱情地接待了我這個年輕的學人，我們曾經談及我的老師高本漢的漢學研究。跟中文大學開始有聯繫大概是在九十年代，擔任了《譯叢》訪問學人七個月，又為中文系和翻譯系做過幾次校外評審員。於中文系做過以辛棄疾詞格律為主題的演講，還有康有為《大同書》的演講，這篇文章後來發表在1991年第3期的《二十一世紀》雜誌上，名字叫〈從《大同書》看中西烏托邦的差異〉。那時，我還在中文系跟莫言和韓少功第一次碰面。

1990年我退休後，就展開大量的翻譯工作。在九十年代把《西遊記》翻譯成瑞典文。《水滸傳》是我在七十年代就已經翻譯好的。翻譯《西遊記》我用了一年半的時間，但翻譯《水滸傳》時因為我已經很早就讀了很多遍這本名著，對它的語言非常熟悉，所以只用了二十六週的時間就翻譯完了。我還翻譯了北島、顧城等朦朧派作家的詩歌，還有很多大陸作家比如山西作家李銳和曹乃謙的作品。我還翻譯了一些台灣的詩歌，跟奚密一起合編合譯了一本英文的《台灣詩選》，裡面收錄了五十位台灣詩人的作品，最重要的台灣詩人如洛夫、痲弦、商禽、羅門、向陽等都包括在裡面了。我自己對楊牧的詩歌比較感興趣，所以幾年前我就把他的詩選翻譯成瑞典語。

我最近一年從事的研究工作主要是上古漢語的文本與當時口語的關係。胡適在他的《白話文學史》中談到文言文就是死了兩千年的語言，我同意他的觀點，漢朝之後的文言文跟當時的口語沒有一點關係。但是上古漢語有很多不同的類型，比如《孟子》的上古漢語，跟《左傳》、《荀子》、《莊子》、《墨子》的上古漢語文法區別很大。我認為《論語》、《孟子》、《左傳》、《墨子》中的上古漢語跟當時的口語有很密切的關係。我對此作了一些研究，我以《左傳》中的一段楚王在戰車上跟手下將軍的長對話為例，看到對話的生動性和戲劇性。我就把這整段話都用上古拼音寫出來，去查有多少同音詞。我發現有百分之三十都沒有同音詞，特別是很多最常用的字如「也」和「為」，還有百分之十五的字有一個同音詞，這兩個同音詞一般一個是不能被否定的名詞或代詞，一個是可以被否定的動詞或形容詞。我希望能繼續研究這個問題，以不同的文本比如《莊子》和《惠子》對比研究。瑞典早期的漢學家曾經認為上古漢語是死的，但我的導師高本漢和法國漢學家馬伯樂則反對這種觀點，馬伯樂認為《墨子》的語言接近當時的口語。

最近一個月，我發現了我之前沒有注意的一個人——周瘦鵑。我認為他在翻譯上的貢獻比林紓大得多。他可以把外國作品翻譯成四種不同的語言：上古漢語、文言文、早期的《水滸傳》式的白話文和當時的國語。他1915年就出版了《歐美名家短篇小說叢刊》，選了四十八位歐美有名作家的作品，譯文非常漂亮，但他的貢獻沒

有被充分認識到。他翻譯過兩位瑞典很好的作家奧古斯特·斯特林堡 (August Strindberg) 和塞爾瑪·拉格洛夫 (Selma Lagerlöf) 的作品。我先把他的譯文翻回瑞典文再去拿那兩個作品進行對比，發現他翻譯真的很漂亮。我寫了一篇相關的文章跟瑞典學院的院士們分享。這就是我近期整理五四前後民國時期中國翻譯家翻譯西方文學的貢獻的一部分。我還查閱了《小說月刊》自創刊以後對北歐文學的介紹和翻譯，茅盾 (沈雁冰) 和他的弟弟沈澤民都參與其中，他那時已加入中國共產黨。一個年輕的中國共產黨黨員，對一個十九世紀瑞典詩人的浪漫詩歌產生興趣並且將它翻譯成中文，那是很有意思的。除了他們之外，我還準備繼續研究其他曾把瑞典文學翻譯成中文的譯者，比如郭沫若和周作人。這些都證明了中國當時對歐洲特別是北歐文學的巨大興趣。很多記者曾經問我中國文學什麼時候能走上世界文學？我的觀點是《詩經》是一部有三千多年歷史的作品，可稱得上是世界文學中最偉大的詩選；公元六世紀初寫成的《文心雕龍》對文學genre (類型) 的整理比同時期的歐洲進步很多；唐朝出現王維、李白、杜甫時，北歐還只有口語沒有語言，中國要比歐洲早兩千年就走上世界文學了。

現在翻譯對於文學的傳播是非常重要的。翻譯家最重要的責任有兩個：一個是對得起原作者，不能隨意增刪，另一個是對得起讀者。《水滸傳》中的詩寫的不好時就要嚴格按照不好的詩來翻譯，不能改成好的詩歌，所以我對「信達雅」中這個「雅」的標準態度是有所保留的，要進行實事求是的翻譯。我翻譯李銳和曹乃謙小說中山西農民的話時，就不使用雅的语言。曹乃謙的小說用了很多很漂亮到位的罵人的髒話，我只好自己發明一些方法將它翻譯出來。中國很多翻譯家把外國作品譯成中文往往翻譯得很好，但把中國作品翻譯成外文時卻往往做的比較差。

我在歐洲漢學學會當主席兼總編輯的時候，邀請了一百位漢學家做了一本英文的1900-1949年的《中國文學手冊》，一共有四冊，四冊分別是一百部長篇小說，一百部短篇小說，一百部詩集還有一百部戲劇 (集)，目的就是不要讓歷史遺忘這些作家。現在一個中國出版社正在準備將這套書出版一個中文的版本。王德威看到這個書覺得非常有意義，復旦大學主辦的《文學》雜誌亦正在組織一批學者對這個書進行評論。

最後，因為我一直一個人工作，所以我認為在香港中文大學工作的學者條件非常好。中大翻譯研究中心的《譯叢》和中文系對翻譯做出了巨大貢獻。我相信中文系以其規模和實力可能繼續做出重要的成果。比之「中國文學」這個概念，我個人更傾向於使用「中文文學」，即所有用中文寫作的文學這個概念。我想中大應該多與世界上有名的漢學家、翻譯家合作，邀請他們來討論翻譯問題，這是很值得做的一個工作。

中國文化研究所首辦「中國文化研究青年學者論壇」

本所主辦的第一屆「中國文化研究青年學者論壇」於2014年6月18至20日舉行，有三十名來自歐洲、亞洲、內地以及本地大學的青年學者參加。開幕禮邀請中山大學逸仙學者講座教授桑兵教授主講「大眾時代的小眾讀書法」。宣讀環節由本校教授擔任主持，參加者各自報告研究的範疇，通過與教授們的討論而得益不少。



訃告

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旗下《中國語文通訊》前執行編輯黃正謙博士於本年六月三日不幸離世，本所同人謹致沉痛哀悼。黃博士畢業於本校，先後於東京大學、倫敦大學亞非學院進修，其後於香港大學獲哲學博士學位。黃博士自2010年12月起任本校中國語言及文學系講師，2012年起兼任《中國語文通訊》執行編輯，直至2013年中離職為止。黃博士任職期間，貢獻心力，多所建樹。

2014年第三次「午間雅聚」

粵語和中文：有甚麼爭論？為甚麼爭論？

鄧思穎 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副教授、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主任

鄧思穎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主修中國語言及文學，先後獲文學士學位和哲學碩士學位，其後在加州大學爾灣校區完成博士論文。研究興趣主要是漢語句法學、漢語方言的理論分析、比較語法學。目前擔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副主任（課程及行政事務），兼任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主任、《中國語文研究》和《中國語文通訊》主編。

2014年3月31日，中國文化研究所「午間雅聚」活動邀請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副教授、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主任鄧思穎教授擔任講者，主題為「粵語和中文：有甚麼爭論？為甚麼爭論？」。

鄧思穎教授首先介紹了香港近來關於粵語的主要爭論，包括粵語是不是「法定語言」、粵語是不是「方言」、粵語是否被「妖魔化」和「普教中」這四個問題。這些爭議緣起於香港教育局網頁於2014年1月底刊登的一篇文章〈語文學習支援〉，該文在提到粵語的時候，在括弧中註明粵語為「一種不是法定語言的中國方言」，引起廣泛討論。此後教育局撤下此文，並於2月2日發表了一篇名為〈「兩文三語」正面睇〉的文章。該文重申《基本法》第九條的規定，「除使用中文外，還可使用英文，英文也是正式語文」，以及《法定語文條例》第三條的規定，「中文和英文是香港的法定語文」。這兩篇文章引發坊間熱烈討論，包括報刊專欄評論、網絡評論等，甚至香港電台製作的「議事論事」節目在2月20日也有專門一節討論這次的「法定語言風波」。

鄧教授圍繞此次粵語所引起的四個主要爭論進行分析和回應。首先是粵語作為「法定語言」的問題。教育局網頁上寫的是「法定語言」，但《法定語文條例》第5章第3條提到的卻是「法定語文」。「語言」和「語文」的區別何在？根據《現代漢語詞典》（第六版）的定義，「語言」一般包括它的書面形式，但在與「文字」並舉時只指口語。「語文」則有兩個含義，一是指語言和文字，二是指語言和文學。因此，嚴格來說，香港有的是「法定語文」而不是「法定語言」。《法定語文條例》的英文版本official languages就不存在這個問題，英文language既可以包括語言和文字，也可以單指語言而不包括文字。因此，粵語是不是「法定語言」這一問題，要看這一詞所強調的重點，若重點在「法定」二字，這就不是一個語言學的問題，而是法律問題。至於《法定語文條例》所規定的「法定語文」包括中文和英文，甚麼是中文？這一定義也存在很多問題。《法定語文條例》和《基本法》也沒有明確界定何謂中文。如果「中文」一詞所指的是語言，到底哪一種語言屬於中文？除漢語以外的少數民族語言是不是中文？共同語以外的方言是不是中文？按照一般大眾的理解，香港所說的「中文」就是教育局所指的「兩文三語」其中的「一文兩語」的總和，即是普通話和粵語。然而，這種理解有沒有得到法律的確認？由此可見，粵語是否具有「法定語言」地位的這個問題，是法律的問題，不是語言學的問題。

第二個爭論是粵語是不是「方言」的問題。2014年2月2日《蘋果日報》刊登了一些相關評論，如網上論壇「港語學」有這樣的回應：「廣東話係粵語嘅標準語，定性為『方言』有矮化粵語之嫌。」除此以外，還有不少報刊文章提到語言與方言的爭論。把粵語當作方言到底是不是矮化粵語呢？根據袁家驊等編《漢語方言概要》的定義，方言是同一個語言的地方變體。Chambers and Trudgill在*Dialectology*一書也提出，語言有不同的變體（varieties），而方言

則是有系統性的變體，也就是一種語言的變體。相對於方言而言，「共同語就是一個民族全體成員通用的語言。方言是民族語言的地方分支，是局部地區的人們使用的語言」（黃伯榮、廖序東《現代漢語》）。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第一章第二條，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通用語言是普通話，即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由此可見，普通話也以方言作為基礎。至於為何以北方話而不是粵語作為共同語這個問題，則不屬於語言學的問題，而是由政治、經濟、文化等等因素造成。鄧思穎教授指出，方言與共同語處於兩個不同的層次，這兩個層次沒有優劣之分，僅僅是通用與否的區別。方言的界定由非語言的因素決定，跟語言本身無關，而方言也不應有「矮化」之意。至於粵語是「方言」還是獨立的「語言」的問題，根據Noam Chomsky所著的*Language and Problems of Knowledge: The Managua Lectures*的討論，「語言」是指“an individual phenomenon, a system represented in the mind/brain of a particular individual”，是儲存在大腦的體系。粵語具備完整的語音、語法，能儲存在每個人的大腦裏，符合獨立語言的條件。因此，從社會因素來看，粵語在中國境內是一種方言；但從完整體系的角度來看，粵語也是一種獨立的語言。粵語既是漢語的方言，又是獨立的人類語言。這樣的說法，是沒有矛盾的。

鄧思穎教授接著談到，教育局在2004年製作給小學推廣普通話的電視節目，在本年二月初被發現有「妖魔化」粵語之嫌。鄧教授明確指出，矮化方言不是正確的態度，每一種語言都是平等的。同樣道理，矮化普通話也不是正確的態度。

最後的問題是爭論已久的「普教中」問題（即以普通話教中文）。香港課程發展議會早於1999年已提出，「長遠考慮：在整體的中國語文課程中加入普通話的學習元素，並以『用普通話教中文』為遠程目標」。這一個問題隨著近年初的粵語爭論而又重新引起關注，而教育局曾於本年初把「普教中學生無分別甚或更差」這一說法從網頁上刪除，更引發爭議。二月初「普教中學生關注組」在網上成立，並設立了「學生哥齊反普教中」的面書。除此之外，還有不少反對普教中的討論文章陸續出現。「普教中學生關注組」近來就香港中小學的普教中情況作出統計，發現已有超過七成的小學實行普教中。至於實行普教中的中學，目前數量不算多，但可以預見待接受普教中的小學生逐漸升中學後，普教中的中學將會增加。

社會上反對普教中的理由主要有五個：一、普通話不是白話文，不是書面語，不是雅文；二、學習普通話技巧，並不能等同於學習語言；三、使用非母語上課會導致學生學習被動；四、師資是一個難題；五、實行普教中會消滅粵語。鄧教授指出，第一個理由屬於定義問題，是語言學的問題；第二至第四個理由，是技術問題，可通過時間來解決；最後一個理由則屬於政治問題，跟語言學無關。普通話是不是白話文？白話文是用白話寫成的文章，也叫語體文。根據《現代漢語詞典》（第六版）的定義，白話文是漢語書面語的一種，是唐宋以來在口語的基礎上形成的，起初主要用於通俗文學作品，到五四運動以後才在社會上普遍應用，成為現代漢語（普通話）的書面形式。普通話以現代白話文作為語法規範，白話文跟普通話同屬一個體系。從目前香港中文教育的實際情況來說，雖然學生在聽、說層面可能仍然使用粵語，但在讀、寫層面早已使用屬於普通話體系的白話文。這樣看來，香港早已實行「普教中」！鄧教授接著提出餘下的問題主要是聽、說的層面，中文教學該用甚麼音來朗讀白話文？用廣州音（粵語）朗讀還是北京音（普通話）朗讀？用廣州音朗讀的白話文算是普通話還是粵語？事實上，香港的中文教育「語」（口語、語音、朗讀）和「文」（書面語、詞匯、語法）往往有割裂的情況。他總結道，「語、文」分家是可行的，但「語、文」一致較為合理。鄧教授提醒我們，要意識到「普教中」涉及兩種不同的理解，第一種理解是朗讀課文的讀音問題，第二種理解是教學語言的問題，兩種理解是不同的，前者是字音學習的問題，後者是教學語言的問題，教學語言屬於語言政策的問題，不是語言學的問題了。

最後，鄧教授回顧近來圍繞粵語產生的幾個主要爭論，並總結他對這幾個爭論的看法。他認為爭論跟社會政治問題和術語的定義有關。社會上由保育意識到本土意識的發展，成為近年香港社會普遍關心的議題。在這種政治氣候的影響下，形成關注粵語的風氣是可以理解的。在近日的爭論中，不少問題顯然跟定義有關，反映了普羅大眾對語言的認識不夠全面，往往離開了語言學的討論，甚至混淆了語言學的概念，引發不必要的爭論。至於粵語未來的發展方向，鄧教授認為保育粵語，應以情為基，以理為法，即以不自大、不自卑的心態認同、珍惜粵語，從語言學的角度認識語言的原理，重視方言研究。

音樂系、中國文化研究所合辦午間音樂會

樂在其中 · 濠上絲竹



音樂系與中國文化研究所再度合作，於2月至4月期間舉行了三場名為「樂在其中·濠上絲竹」的午間音樂會。十多位音樂系同學以小組或獨奏形式演出，曲目包括：喜洋洋、鳳陽花鼓、步步高、良宵（二胡揚琴合奏）、天山詩畫（揚琴獨奏）、晉調（笙、中阮合奏）等等。演出的樂器種類繁多，包括拉弦樂器（高胡、中胡、二胡）、彈撥樂器（琵琶、中阮、三弦、古箏、楊琴、柳琴）、吹管樂器（笛子、笙、簫）以及打擊樂器等。活動吸引近百名觀眾，校長沈祖堯教授也抽空蒞臨觀賞同學們的演出。



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

「近代人物傳記及數據庫建設」學術研討會

本所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與復旦大學歷史系及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聯合舉辦的「近代人物傳記及數據庫建設」學術研討會，於2014年5月8日及9日假中國文化研究所圓滿舉行。共二十一位來自中、港台的學者在會議上發表論文，研究成果圍繞「香港商人家族」、「建置人物資料庫」、「政治與軍事人物傳記」、「企業家的故事」、「人物傳記研究」及「女性與藝術家」六大主題。出席學者包括復旦大學熊月之教授、姜義華教授，中央研究院黃克武教授、謝國興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梁元生教授、鄭會欣教授等。



研討會蒙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贊助，謹此致謝。



近代人物傳記及數據庫建設
學術研討會
2014年5月8日及9日

歷史系



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和中國語言及文學系中國語文教學發展中心聯合主辦「四年制大學中文論壇」



「四年制大學中文論壇」於2014年4月25日舉行，由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和中國語言及文學系中國語文教學發展中心聯合主辦。

香港在2012年開始實行大學四年制。在新學制下，各院校推出新的中文課程，提升學生語文水平。隨著新課程的落實，本校舉辦論壇讓各院校的代表聚首一堂，匯報這兩年來新課程的推行情況、課程的特色和學生語文學習的需要，分享寶貴經驗。論壇由副校長侯傑泰教授和中國語言及文學系系主任何志華教授致歡迎辭，由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主任鄧思穎教授為研討會作總結。



最新出版

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中國語文研究》第34卷第3期

《中國語文研究》第34卷第3期已於2013年12月出版。本期刊載兩篇英文文章：

1. 魏廷冀：漢語的片段語問句與刪除
2. 羅振南：納西語語序及句子成分結構

文章可從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網頁下載：<http://www.cuhk.edu.hk/ics/clrc/>。



文物館「北山汲古——中國書法」展覽

文物館由四月十二日起至十一月舉辦「北山汲古——中國書法」展覽，分兩期展出由北山堂惠贈共一百項由唐朝至清朝的書法作品，展現中國書法的藝術魅力與文化意涵。「北山堂」是已故利榮森博士的私家堂名，收藏中國文物甚為豐富，尤以中國書畫最為著名，其中大部分已贈予中大文物館。文物館計劃舉辦一系列專題展覽，以全面介紹北山堂的各项藏品及捐贈文物。「北山汲古——中國書法」是首個展覽，與中大藝術系合作策劃，並編製了同名大型圖錄。展覽歡迎公眾參觀，費用全免，同時亦會安排一系列教育活動，引起觀眾認識及學習書法的興趣。

中國書法不僅具有筆墨點畫之美，更蘊含豐富的文化內涵，故觀傳世書蹟，除可見名家書藝以及風格的傳承與變革，亦可見時代興衰、人品氣節、學問修為，以至文人的交遊、酬應等活動，窺探其源遠流長的歷史文化。

「北山汲古——中國書法」展覽分兩期展出由唐至清各朝書蹟一百項，包括寫經、詩文、尺牘、對聯、書論、文稿等，亦有罕見的忠臣血書與文人借券，當中有皇帝御書，有倪瓚、祝允明、文徵明、董其昌、黃道周、傅山、張瑞圖、何紹基等名家手筆，亦有具地區特色的廣東書法，如陳獻章、鄭露、蘇仁山等的作品，品類豐富，風格紛陳，足以展現中國書法的藝術魅力與文化意涵。以下特選六件作品以作介紹：



1. 唐人 楷書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麻紙手卷，25.4 × 680 釐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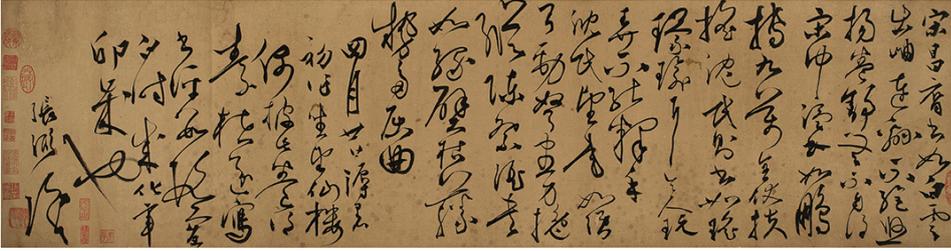


2. 宋寧宗(1194-1224 在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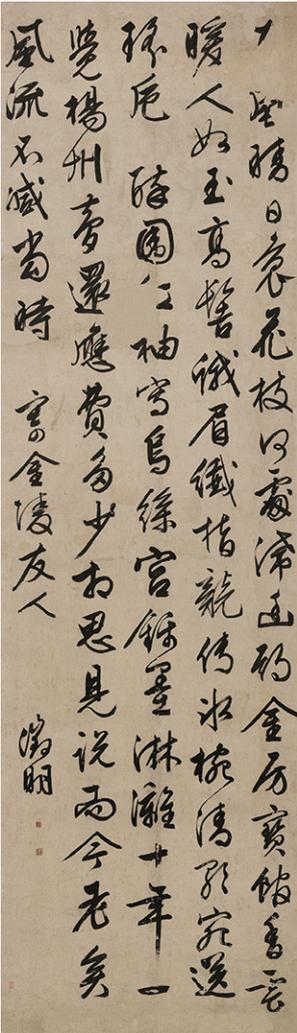
楷書為坤寧生辰詩

丙子(1216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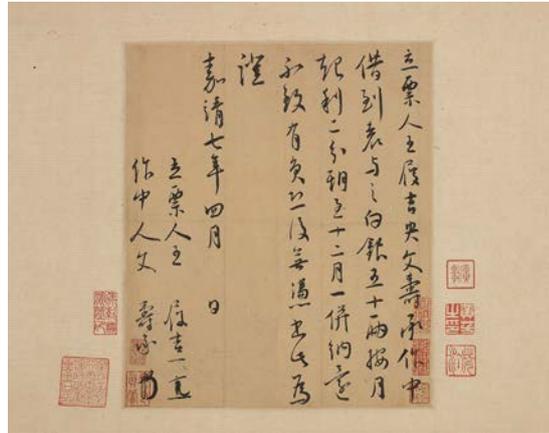
綾本冊頁，19.6 × 20.7 釐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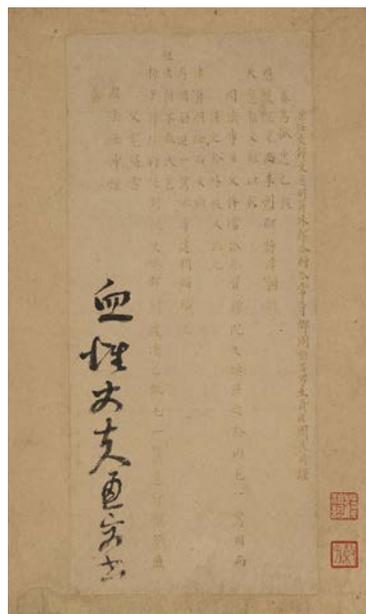
3. 張弼 (1425-1487)
草書評書
成化辛卯 (1471 年)
紙本手卷, 26.5 × 102.5 釐米



4. 文徵明 (1470-1559)
行書寄金陵友人詞
無紀年, 1528 年或以後
紙本立軸, 348 × 103 釐米



5. 王寵 (1494-1553)
行書借券
嘉靖七年 (1528 年)
紙本手卷, 本幅: 24.3 × 21.5 釐米



6. 周茂蘭 (1605-1686)
血疏貼黃稿
無紀年, 約 1628 年
紙本手卷兩卷, 本幅: 28.8 × 72.5 釐米

為配合展覽，文物館與北山堂基金特別合作設計教育展廳「臨池·學書」，以深入淺出的方式介紹書法藝術的基本知識，引領觀眾認識中國書法的內涵，同時安排一系列教育及公眾活動，包括公眾導賞團、大師講座、工作坊、書法示範等，進一步引起觀眾學習書法的興趣。詳情請瀏覽：<http://www.cuhk.edu.hk/ics/amm/>。

展覽同名圖錄現已出版，圖錄一書三冊、中英對照，除收錄八篇專文外，更刊印一百件展品的說明及釋文，詳盡地介紹北山堂所藏書法的特色，是研究中國書法的重要參考。

展覽詳情如下：

日期：第一期：2014年4月12日至8月3日
第二期：2014年8月11日至11月16日

地點：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展廳II、III及IV

開放時間：星期一、二、三、五及六 上午十時至下午五時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下午一時至下午五時
星期四、新年、農曆新年、復活節及聖誕假期 休館

編輯委員會

主席：黎志添

成員：王宏志 朱國藩 嚴桂香 何潔賢 梁子煒 李潔兒